

郭沫若研究丛书

跨越时空的自由

——
郭沫若研究论集

李怡 著

東方出版社

跨越时空的自由

——郭沫若研究论集

李 怡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时空的自由——郭沫若研究论集/李怡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4

ISBN 978 - 7 - 5060 - 3078 - 6

I. 跨... II 李... III. 郭沫若(1892 ~ 1978) - 思想评论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911 号

跨越时空的自由——郭沫若研究论集

KUAYUE SHIKONG DE ZIYOU——GUOMORUO YANJIU LUNJI

李怡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181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978 - 7 - 5060 - 3078 - 6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郭沫若研究丛书》总序

杨胜宽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横跨多学科的文化大家；而且，他“亦学亦政”，其后期还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去世后，邓小平赞誉他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文化旗帜。

鲁迅与郭沫若堪称现代中国文化“天幕”中的双子星座，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某种意义上，郭沫若的潜在研究价值甚至有可能超过鲁迅。

这是因为，首先，郭沫若涉足的学术领域比鲁迅更为广博。除文学之外，他还兼治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而且均成绩斐然，卓然成家。鲁迅和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上，各有千秋，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只不过由于郭沫若的治学范围太宽，致使多数专业知识单一的研究者像瞎子摸象似的，仅能领受其部分华章，而难以感知其整体风采。

其次，郭沫若比鲁迅多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40年历史风云，而且他是与政治联系得最紧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多次从戎、从政，他“改造世界”的兴趣远远大于“解释世界”。研究他，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现代中国复杂纷纭的历史剪影。郭沫若留下的上千万字的著述，都是他建构、阐释、宣传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记

录，凭借它们作为“以文证史”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一个“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的大课题。

再次，郭沫若与鲁迅各有不同的文化个性。如果说鲁迅身上更多的具有值得知识分子效法的、让人肃然起敬的“典范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典范性与典型性的统一”。如果说鲁迅身上更多的具有批判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如果说鲁迅身上更多的表现为“独立性”的话；那么，在郭沫若身上则表现为“独立性与顺应性的统一”。鲁迅与郭沫若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文化个性，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一生主要生活在体制外，郭沫若后期则是体制中人。事实上，郭沫若后期的思想文字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身上的典型性、建设性和顺应性，其实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感召下，自觉地向郭沫若看齐。所以，可以把郭沫若看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研究他，不仅可以大致窥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而且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走向未来，如何进行精神重建，均不乏启迪意义。

郭沫若身上的时代印记是极为鲜明的，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造就了郭沫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们不仅丰富了郭沫若研究的内涵，同时也使郭沫若研究相当地具有挑战性。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郭沫若研究明显落后于鲁迅研究。作为郭老故里的专业郭沫若研究机构，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深化郭沫若研究，拓展郭沫若研究，组织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和全国郭沫若研究专家，围绕中心重点课题开展研究，计划编辑、出版这套“郭沫若研究丛书”，以此对郭沫若研究尽一份学术职责。

目 录

《郭沫若研究丛书》总序	杨胜宽 1
-------------------	-------

创作论

《女神》与屈骚	3
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	
——郭沫若诗歌的文化阐释	16

文化论

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	
——鲁迅与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之比较	35
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	
——郭沫若与现代四川文学片论之一	54
青春的诗情与“年轻”的文化人	
——郭沫若及现代四川作家片论之二	72
巴蜀文化的 20 世纪体验者	
——郭沫若与四川经典作家札记	83

郭沫若与中国 20 世纪学院派文化的分离	105
研讨中国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	
——从郭沫若与乡土文化所想到的	112

思潮与思维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输入中国的几个问题	
——兼及郭沫若与创造社	119
郭沫若、创造社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130
时空的自由与郭沫若的感受方式	148

学术史论

抗战文化、抗战文学与郭沫若研究	165
郭沫若研究二题	175
关于郭沫若与四川地域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两种思考	182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问题	182
二、巴蜀学派与当代批评——与毛迅对话	187
后记	200

创作论

《女神》与屈骚

一

《女神》的评析与郭沫若屈原观的讨论历来都是整个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前者，西方浪漫诗学、个性主义、古今中外的泛神论思想都得到过深入的、全面的和反复的阐述，对于后者，又显然主要同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及历史剧创作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屈原与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关系，特别是屈骚与《女神》的精神联系，则始终没有展开过更细致更认真的开掘。我认为，这一现象（我称之为“学术盲点”）的存在有它充分的根据，但也由此而失去了一个解剖《女神》内核的机会。

追溯《女神》研究史我们可以知道，闻一多1923年的两篇评论提出了《女神》研究中最权威的结论：《女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但也显得缺少“地方色彩”，即民族特色。^①无

^① 参见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论后人对闻一多的这番评论作怎样的修正，有一个基本的思路是不曾改变的，即都是将《女神》置于引入西方文化、西方诗学以改造中国旧文学、建设中国新诗这一背景上来加以认识，在这样一个基准上，郭沫若的一些自述也就得到了格外的重视，比如他说：“我短短的做诗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二段是惠特曼式”，“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①

在中国新诗作为“史”的进步意义上，最充分地开掘《女神》的时代精神、外来影响这绝对无可指责，但是，任何理论性的阐释在就对象作出更清晰的判断之时却也同时意味着某种令人遗憾的“遮蔽”。比如，当《女神》被视为西方个性主义、浪漫诗学的传达也就“遮蔽”了郭沫若与其他一些“五四”作家所不相同的文化观：在崇尚西方文化的同时，他又大声呼唤“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②在郭沫若的文化观念中，西方文化、西方诗学往往没有居于至尊无上的地位，它们总能与东方文化、中国诗学互相解释、互相说明，来自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相应的契合，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又似乎总是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显示出与时代精神、外来文化的呼应。所以说，《女神》的文化意义绝不是晶莹单纯的，它是一个由多种文化彼此结合、互为表里的文化汇合体，并且恰恰是在那些富有时代精神、西方印迹的诗歌当中，我们往往可能发现郭沫若自觉进行中西联络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不自觉状态下浮现着的传统诗歌的“原型”模子。

从“有记忆的二三岁时”所暗诵的“唐人绝句”，到家塾里读的《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当然还有《诗经》、《楚辞》，郭沫若所接

^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② 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受的中国传统诗教相当丰富，我认为其中最值得我们仔细分析的就是《楚辞》，特别是屈原的作品（即屈骚）。

按照中国传统的蒙学惯例。屈骚即使不是郭沫若最早的诗教也肯定是他较早接触的古典诗文化读物，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一旦郭沫若进入到这一瑰伟的艺术世界，其所产生的影响就将再难抹去了。诗人后来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①在保存下来的郭沫若少年诗稿中，与屈原相关的诗句比比皆是，直到四十年代，他还在诗中满怀感情地说：“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华夏今再生，屈子芳无比”^②，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郭沫若曾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这样来描述屈骚的特征与地位：

“他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他有敏锐的感觉性，接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更加上他的超越的才质和真挚的努力，他的文学革命真正是得到了压倒的胜利。气势和气质都完全画出了一个时期。”^③

“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文，在二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④

① 郭沫若：《屈原·序》，原载开明书店1935年版。

② 郭沫若：《今昔集·题画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③ 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④ 郭沫若：《诗歌底创作》，原载1944年《文学》第2卷。

郭沫若对屈骚的估价与今人对《女神》的估价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充分地证明了，郭沫若是以“五四”时代的文化需要、文化追求来观照屈骚，同时也意味着屈骚精神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对“五四”文化思潮的一种阐释方式，所以说，他在评述屈骚之时，也不自觉地描绘了自己！

就在《女神》创作的1920年，郭沫若就曾公开自比为屈原，他的诗歌创作观念深深地为屈骚精神所感染，他是在与屈骚的自觉应和中开始了《女神》的精神展示。

二

翻开《女神》，也翻开两千多年前的屈骚，我们不难辨认出两者在艺术表现上的诸多共同之处，诸如绚烂奇幻的浪漫想象，璀璨繁艳的词藻，丰富多彩的比喻艺术，以及“览相四极”式的恢宏壮阔的时空意识。但是，我认为，对于认定文学革命“第一义是意识的革命”的郭沫若而言，^①我们更应当透过这一系列的艺术表现的因素，深入到诗人内在的人格追求、人生理想中去，从中寻找《女神》与屈骚的深层联系。正是从这一人格追求出发，郭沫若才可能在“五四”那样一个文化移植、文化变革的时代，纳故而又鼎新，熔古今中外的诗学精粹于一炉。

作为“五四”时代的返照，郭沫若理解的屈骚洋溢着自由与抗争的意识。郭沫若缅怀着那体现“我们固有的精神”的先秦时代，而又常常

^①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把屈骚作为这“反抗宗教的，迷信的，他律的”先秦文化的集中体现，他说：“假使中国当时不是由秦国来统一，而是让楚国来统一了，文化发展的情形必然有些不同……中国由楚人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①“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②

就在这类不乏“创造性的误解”中，郭沫若打通了屈骚与时代精神的联系，屈原的所谓自由与反抗构成了《女神》融会西方个性主义与浪漫诗学的重要基础。

在《女神》里，既有直接表述屈原襟怀的诗剧，又有抒写诗人个性意识的诗歌。西方浪漫主义的个性不时闪烁着屈骚式自由与反抗的印迹。屈原的感怀之辞也包含着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个体特征。如诗剧《女神之再生》颂扬“女神”放弃补天而进行自由创造，诗剧取材于《列子》、《山海经》，但在它抒情的高潮却化用了《九歌》中的诗句：“万箭金箭射天狼”。（“举长矢兮射天狼”）又如《凤凰涅槃》中“凤歌”云：“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你自哪儿来？/你坐在那儿在？/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着你的空间，/他从那儿来？/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这样的挑战式怀疑精神也容易让人想起《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郭沫若在1923年总结了新文学的反抗精神，认

① 郭沫若：《今昔集·论古代文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

② 郭沫若：《蒲剑集·关于屈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第23页。

为“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①《女神》就是“新诗坛上一颗炸弹”^②与之同时，诗人又认为屈骚是“有时像狂风暴雨快要来的一样，有时就竟直像狂风暴雨”^③凡以上均可谓现代诗学与屈骚精神的联系。《创造十年》中，诗人又追述说，《湘累》中“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这又显然是在屈原那里灌注了现代的意识。总而言之，郭沫若从屈骚中所辨认的自由抗争精神已经与现代浪漫主义的个性意识深深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通向现代诗学的道路上，屈骚的原型意义熠熠生辉。

三

以母体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融合又总是与一定程度的文化改造相联系的，母体文化取舍、增减、缩放外来的诸多要素，以达到与自身的融合。屈骚精神作为《女神》浪漫主义个性追求的基础也从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改造了西方诗学的内涵。这一“改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自我（或抒情主人公）人格内涵的改造。郭沫若特别强调诗人的人格铸造，谓“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成为真正的诗人”，甚至还

① 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5页。

② 素数语，见1923年7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

③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屈原简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

提出：“个性发展得比较完全的诗人，表示他的个性愈彻底，便愈能满足读者的要求。”^①这显然是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的观点，但与之同时，诗人又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中国古典诗人视作“人格圆满”、“个性完全”的典型。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中修正着对“人格”内涵的理解。在《女神》里，自我（或抒情主人公）的人格内涵就不时染上屈骚的风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就是重视个人的内在修养，特别是道德修养。诗剧《湘累》中的屈原、《棠棣之花》中的聂荃，《凤凰涅槃》中“甘美”，“光华”的凤凰，《无烟煤》中渴求知识的“我”，《三个泛神论者》中崇尚自食其力的“我”，《电火光中》认同于苏武的“我”，《地球，我的母亲》里身作孝子的“我”等等。虽然受到西方浪漫主义自我表现的影响，但郭沫若似乎无意过多地展示抒情主人公复杂的人格内涵，他着墨较多的还是人格中具有不同的道德意味的自我完善的一面。诗人对自我完善、道德节制之重视，也使之在可能进行自我表现的时候，反倒踟躇不前或者躁动不安起来。比如《天狗》，一般都把它作为郭沫若个性主义自我扩张的典型，而仔细分析起来，“天狗”从吞噬宇宙到吞噬自我，这一心理流程与其说是浪漫主义者信心十足的自我扩充，还毋宁说是诗人在企图自我表现的时候，由于某种无形力量的束缚而产生的迷乱与失措，如果再认真追究下去，我们则可能进一步感觉到，这种无形的力量似乎还不是外在的，它就来自于自我的内心世界，属于某种内在的空疏性，它难于担负起如此宏大的宇宙意识，难以为气势磅礴的扩张提供源源不绝的能量，这一无意识中的空疏性是否就与意识领域的道德自律有关呢？因为，意识层次的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克制，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出这样一个结果：当诗人在自我扩张、自我表现时，反倒不知如何扩张、如何表现了！所以他焦

^① 郭沫若：《文艺论集·论诗三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338页。

躁不安，他心绪不宁，只能反复提醒自己：“我便是我呀！”

自我完善的道德型人格也决定了《女神》不时在屈骚的意义上表达“自由”与“反抗”意识。《女神》的诸多篇章都表明，它的“自由”与“反抗”时常都不是纯粹个体性的、它总是以民族的自由、民族的解放为己任，归根结底是为了济世救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这一济世救民的理想有时表现为一种以儒家精神为内核的古典英雄主义，如《棠棣之花》中仗剑远行的聂政：“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对古典英雄主义而言，自由与反抗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才是其最执著的愿望，《匪徒颂》里，郭沫若排列的“匪徒”都是为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仁人志士。有时，诗人满怀着对普通劳动者的钦敬与崇拜，但却在无意中流露了一位救世者与庶民百姓间的些许间隙，如《缀了课的第一点钟里》：“工人！我的恩人！/我感谢你得深深，/同那海心一样！”此外，个体自由与群体理想的结合也使郭沫若自身的喜怒哀乐不时地借助于群体感情的框架，如《炉中煤》，这首诗奇妙地将来自两个端点的感情糅合在一起：纯粹个人的爱情与纯粹集体的民族感情，读者自然也容易想到男女之情在屈骚中所承担的特殊意义。

屈骚精神也改造了《女神》的情感表现特征。

来自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是一种超越了道德意义的彻底的自我展示、自我抗争，屹立在自然与社会的制高点上评说人生世事，就是它主要的情感表现方式，如雪莱的《自由颂》：

一个光荣的民族又一次
发出照耀万邦的闪电：自由
把熊熊的火焰直射到天空，
从心灵到心灵，从高楼到高楼，
在西班牙国土上闪烁着光辉，